

历史记忆与作家职责

——村上春树随笔《弃猫》以及相关言说

邹波

战争的责任并未清算，历史的重负并未消失。在日本开启令和时代的当下，追忆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显得尤为必要。村上在这样的时间点讲述战争记忆，出自一种责任与良知，意在提醒国民正视历史。

2019年10月10日，诺贝尔文学奖揭晓。波兰作家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 (Olga Tokarczuk) 与奥地利作家彼得·汉德克 (Peter Handke) 分获2018、2019年度的诺奖，之前获奖呼声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擦肩而过。然而就在次日，村上春树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 (Grinzane Cavour Prize)，也可谓失之桑榆，得之东篱。

在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，村上春树做了题为《洞窟中小小的篝火》的演讲。他从自己经营爵士乐酒吧、29岁开始写小说讲起，指出“小说的历史自从人类穴居开始业已存在”，人们围坐在篝火前讲述故事，驱散饥饿与恐惧。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，便是创作故事。“如果能够照亮存在



虽然，今年村上春树又与诺奖擦肩而过，但2019年10月11日，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。

于世界各地的黑暗，则是无上的喜悦。”村上运用洞穴、篝火前的讲述故事，驱散饥饿与恐惧。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使命，便是创作故事。“如果能够照亮存在

2019年第六期的《文艺春秋》上，登载了村上创作的随笔《弃猫——当我谈父亲时我要谈的》(以下简称《弃猫》)，作品刊载后引起了很大反响，其

中关于父亲(村上千秋)战争经历的部分，尤其受到读者与评论家的瞩目。作品出版之后，村上又在其他杂志上发表了访谈、游记、随笔，形成了彼此呼

应、互为补充的文本群。而且，2019年10月7日出版的《The New Yorker》杂志上刊登了随笔《弃猫》的英文翻译，作品随之进入英语国家的阅读视野。本文将围绕村上在《弃猫》中讲述的历史记忆与作家的职责，勾勒出近年来村上对于历史、现实的新的思考。

《弃猫》——历史无法遗忘

为了纪念村上春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周年，新潮社于今年推出了《刺杀骑士团长》的普及版文库本。四十年前的1979年，村上的《且听风吟》于讲谈

(下转6版) ➔

◀ (上接4版)

《元宵灯会》是两篇有关中国民情风俗的介绍。前篇记载从媒人提亲、算双方生辰八字，到下聘礼、迎娶新娘的整个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过程。后篇介绍元宵灯的各种样式、灯会的起源、元宵吃糯米圆子的习俗。

这些内容从多个角度记录和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，因此，这本年鉴不啻为外侨了解这个东方国家的重要指南。

三、记载上海开埠初期的重要信息

《上海年鉴1852》保留了上海开埠初期的许多重要信息。它所提供的《上海口岸1840—1850年气候观测均值一览表》和《气象测量记录摘要》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份连续的、系统的气象统计史料。虽然，英国早在19世纪初期就开始系统地观测天象，但直到1861年才有了第一份全国性天气预报的发布。

《上海年鉴1852》还提供了开埠以来外国侨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统计、机构行号等

资料。在这些资料中，外国侨民在上海的职业、身份和地位清晰可辨。此外，该年鉴中还包含了有关上海港区的水文资料，主要是为便利外国船只进港、出港使用。《扬子江航行须知》一文，清晰地提示了外国船只如何由嵎泗列岛进入长江口，然后进入黄浦江的操作要点。

该年鉴中还刊载了当时西方人绘制的最详细上海地图，北至吴淞江虹口到曹家渡一线，南至白莲泾到龙华一线，东至黄浦江陆家嘴，西至徐家汇、法华镇，包括了境内重要的河道、步道、桥梁、寺庙以及其他地理信息，地名均分别用中英文标注，也解决了中国读者阅读早期外人对于上海叙述的许多难点。

《徐光启记略》一文的主要价值在于，它记载了作者亲自考察过的一些遗迹，包括城内徐光启的故居与祠堂、晚年居住过的“双园”以及徐家汇徐家老宅的情况。徐光启在上海的活动，在今天上海史、中西交流史等方向上的研究，均占有一席之地，年鉴中的记载对今天的徐光启研究亦有重

要的参考意义。

2018年1月13日，黄浦区光启南路在市政道路改造拆除旧房过程中，发现两根古牌坊石柱，经初步考证，是“阁老坊”或者“太卿坊”。据《上海年鉴(1852)》中《徐光启记略》一文记载：

到上海县城去游览，在狭窄的街道东游西逛，穿南行北，在城中附近多半可以看到一个大石坊，上面刻着“阁老坊”三个大字。……由牌坊沿通向南城门的街道直行过半，在路的西侧一段铺面间立有不易注意的“太卿坊”，镌刻的字有些破损，坊的挑梁上刻有“明相国徐文定公祠”。

四、反映早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识

通过文献中各篇文章对中国的介绍，可以窥见开埠初期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初步认识。在《略述中国人的科学——算术》一文中，作者驳斥了一些西方人贬低中国人在算学方面能力的观点，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早5个世纪便已经运用多项式方程运算，开方术也是由中国人独立发明的，并指出“如果中国人以

更大自由与西方交流，将会促进双方的取长补短，激发他们的科学研究精神”。在《江南乡试》中，作者认为“中国已立于文明和文化国家之列”，“大批人从早年就花精力学习丰富而广泛的著作，在某些方面与欧洲人学习经典语言是相同的”，以至于“使我们不能轻看他们，把他们视为只是一批过着粗俗肮脏生活的群氓”。在《论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对欧洲天文学的推介》中，作者认为中国人“在学习写作诗赋和八股文方面花去了太多精力，无心关心科学”。在《扬子江航行须知》中，作者认为当地测量官员的航行须知是模糊不清的，建议每艘前往上海的船只应配备1843年英国海军部的航海图。

本书作为早期西人在中国编纂的年鉴，具有文献学价值，兼具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。上海是中国最具开放性的城市，中西文化在此相汇交流、融合生长，不断挖掘上海城市的历史史料，给今天的城市管理以借鉴，这正是重视早期年鉴史料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的意义所在。

此次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《上海年鉴(1852)》的翻译整理出版，是继《上海年鉴(1854)》影印出版后，又一次对历史文献的开发利用。上海是中国年鉴的发源地，也是中国年鉴重镇。据《民国时期总书目》记载，民国时期共出版过各类年鉴约280余种，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出版的《世界年鉴》被视为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年鉴。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《中国年鉴(第一回)》，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英文版《中国年鉴》，分别于1933年和1935年始编的《申报年鉴》《上海市年鉴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，民国时期成为中国年鉴事业的蓬勃发展期，为我们研究近现代上海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。年鉴诞生于西方社会，《上海年鉴(1852)》的翻译出版，也呈现了年鉴文化西学东渐的轨迹。《上海年鉴(1852)》在年鉴史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，是年鉴在上海的起点，并深刻影响民国时期年鉴文献的发展，值得好好研究。